



A Study of Arthur Evans Moule's Views of
China in Late Qing Dynasty (1861-1910)

丁光
◎ 著

慕雅德眼中的
晚清中国
(1861—1910)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慕雅德眼中的 晚清中国

(1861—1910)

丁光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慕雅德眼中的晚清中国:1861~1910 / 丁光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308-14065-2

I. ①慕… II. ①丁…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
1861~1910 IV. ①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5570 号

慕雅德眼中的晚清中国(1861—1910)

丁 光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62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065-2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教育部哲社科研重大课题

“外国收藏的16—20世纪来华传教士档案整理与研究”（09JZD0014）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慕雅德与晚清中国（1861—1910）”（13NDJC021Z）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慕氏家族与杭州”（A13WH03）研究成果

A Study of Arthur Evans Moule's Views of
China in Late Qing Dynasty (1861-1910)



序

清末民初,曾经有成千上万名新教传教士不远万里、前赴后继地从欧美各国来到中国,以传播基督教的福音。在传教事业最为鼎盛的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在华新教传教士的人数曾一度高达 7000 多人。由于生老病死,以及战争、传教士教案等各种不同的原因,在华新教传教士的总人数是在不断流动和更新的。每年都会有一批传教士离开中国或在中国去世,又会有一批新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继续着前者未竟的事业。根据保守估计,1807—1949 年间来过中国的新教传教士总数或许高达数万人。

上述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群体基本上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很多人在大学毕业之后还经过好几年在神学院的学习和训练,相当于现在的硕士或博士。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新教传教士们在传教工作中特别注意文字工作:除了将圣经翻译成官话和各地方言,以及深文理、浅文理、白话等不同风格的文体之外,他们还通过办报纸、办杂志,撰写宗教小册子等手段在中国传播西方的文明。另外,许多传教士在华期间保持了记日记的习惯,并且频繁地给远在祖国的家人、朋友写信,定期地给传教使团的总部写报告,有的还积极向教会杂志和期刊投稿,介绍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和所在地的风土人情。由于在华的各个传教使团都为配合传教活动而创办了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所以传教士们需要经常去欧美募捐,以便能维持上述机构的正常运行。而最佳的募捐方式莫过于出版游

记、自传、回忆录等书籍,用文字和图像记录中国的生活场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传教士们在中国为传教目的而努力工作的真实情况,以吸引他们对中国和在华传教工作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200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新教传教士们描写中国的书和文章时,不禁经常会感到亲切和心灵的震撼。因为传教士们在描写中国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生活时,往往具有独特的西方视角,关注一些经常会被我们所忽略的细节,如社会市井和传统习俗,物质或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与此同时,他们又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他们的作品,无论是文字描述还是图像记载,往往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承载着我们对于百年前中国社会的鲜活历史记忆。令人惋惜的是,在浩如烟海的来华新教传教士作品中,迄今只有极少数的作品被介绍给了中国的读者。这一特定领域就像一座储量不明的金矿,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开发。

丁光的博士论文《慕雅德眼中的晚清中国(1861—1910)》正是这样一种掘金的尝试。慕雅德这个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的名字过去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并不熟悉,但他在西方,尤其是在英国,却有着较高的知名度。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出生于一个著名的传教士家族,很早就来到了中国,并且长期担任英国圣公会华中教区的会吏长这一重要职务;还因为他在传教工作的百忙之中,竟然挤出了足够的时间,用英语撰写了16本书、2本小册子,以及散见在各种期刊之中,数量不明的投稿文章;并用中文官话和方言翻译和撰写了至少15本宗教小册子。慕雅德在中国前后生活和工作长达50年之久,见多识广,阅人无数,对于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均有其独特的看法。1861年他刚来中国时,正好遇上太平军攻打宁波城和杭州城。在近距离观察这一重大而残酷的历史场景的同时,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太平天国运动背后所隐藏的一种积极意义,即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意识正在形成,他们借西方宗教的名义起义,实际上是在寻找改革的道路和探索救中国的方法。出于新教传教士的正义感,他强烈谴责英中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一再呼吁英国政府立即停止这一伤天害理的行为。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命运更具有深切的同情。慕雅德对传统中国文

化,包括宗教、迷信和风水理论等也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认同“孔子加耶稣”的包容主义传教策略。然而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慕雅德对他曾经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宁波和杭州这两个城市情有独钟,对它们的人文和历史背景谙熟于心。在他叙述自己对这两个城市的印象时,各种典故和引语信手拈来,而且他所描述的各种细节的准确性令人惊叹。关于上述慕雅德的各个方面,丁光在其论文中均做出了恰如其分的介绍、分析和评价。

丁光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她原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并未受过历史学研究的专门训练,所以在一开始曾经历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犹豫和彷徨,自己并不清楚是否能够完成这样一篇偏重于历史学的博士论文。但她及时调整了心态,比较踏实地投身于论文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之中。最初她去了香港城市大学半年,对那儿的传教士档案收藏做了仔细的调研和查阅。之后,她又去英国圣公会档案的原藏地伯明翰大学图书馆,在那儿又做了六个月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为她的论文写作收集到了较为完整的研究素材。由于英语文学的论文写作跟历史学方面的论文有着较大的差异,丁光在论文的具体写作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先后五易其稿,才拿出了一个较为规范的博士论文。这种坚忍不拔的韧性值得赞赏。

由于此前国内还没有人做过慕雅德的专题博士论文,所以她的这篇博士论文在不少方面还是具有原创性的。

我很高兴地得知,丁光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又成功申请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即将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研究,其研究课题仍为慕稼谷、慕雅德这两个家族为在华传教事业和汉学研究做出的贡献。作为她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我衷心祝愿她能在这一研究领域内再接再厉,做出新的贡献。

浙江大学英语系

沈弘

2014年9月25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12)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理论	(24)
第四节 本研究主要文献资料来源	(30)

第一部分 初识中国：慕雅德在宁波和杭州

第一章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慕雅德与宁波	(37)
第一节 宁波历史记忆	(37)
第二节 宁波的基督教信徒	(46)
第三节 古迹溯源：石雕供桌、天封塔、桃花渡	(49)
第四节 宁波的教会学校——三一书院	(55)
第二章 慕雅德的杭州印象	(62)
第一节 杭州的牌坊	(63)
第二节 杭州的慈善和钱塘江义渡	(65)
第三节 杭州的街巷和杭州人	(68)
第四节 杭州的翻坝	(75)

第二部分 慕雅德与晚清中国事件

第三章 慕雅德眼中的太平天国运动	(81)
第一节 亲历太平天国运动	(82)
第二节 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	(92)
第三节 探究太平天国运动的缘起和失败的原因	(101)
第四节 功过是非:对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之评价	(109)
第四章 慕雅德对鸦片贸易的评述	(115)
第一节 揭示中国人吸食鸦片的历史真相和鸦片贸易的实质	(115)
第二节 论鸦片贸易对来华传教事业的危害	(121)
第三节 反鸦片的行动	(124)

第三部分 慕雅德与中国文化

第五章	慕雅德与“礼仪之争”	(133)
第一节	明末清初“礼仪之争”	(134)
第二节	清末“礼仪之争”	(139)
第三节	对“礼仪之争”态度的渐变	(142)
第四节	对祖先崇拜的应对策略	(145)
第六章	慕雅德对中国的宗教、迷信和风水的评析	(152)
第一节	对儒学的研究	(153)
第二节	对佛教的研究	(165)
第三节	对中国迷信和风水的研究	(172)
第七章	慕雅德对中国科举制的评述	(179)
第一节	19 世纪传教士对科举制的评述	(180)
第二节	慕雅德对中国科举制的论述	(183)
第三节	慕雅德对科举制的思考	(186)
第八章	慕雅德的中国传统礼仪观	(194)
第一节	对《礼记》的研究	(195)

第二节 “乐于天,而礼于地”的传教策略	(197)
第三节 对中国传统礼仪中陈规陋习的批判	(198)
结 语	(203)
附录 1 慕雅德生平介绍	(205)
附录 2 英国圣公会浙江教区	(213)
附录 3 慕雅德家谱	(219)
参考文献	(221)
索 引	(241)
后 记	(248)

图目录

图 1-1	宁波府城图	(40)
图 1-2	宁波永丰门	(41)
图 1-3	宁波西门掠影	(42)
图 1-4	宁波和义门	(43)
图 1-5	宁波接官亭	(44)
图 1-6	宁波月湖	(44)
图 1-7	宁波梁祝墓前的石雕供桌	(50)
图 1-8	宁波天封塔	(51)
图 1-9	宁波老江桥	(53)
图 1-10	宁波三一学校	(58)
图 2-1	牌坊	(65)
图 2-2	钱塘江	(68)
图 2-3	杭州凤山水城门	(69)
图 2-4	放风筝	(74)
图 2-5	翻坝	(76)
图 6-1	慕雅德、孔令貽等名帖	(158)
图 7-1	圣公会女子学校	(187)
图附录 1-1	青年慕雅德和晚年慕雅德	(207)
图附录 1-2	1911 年慕雅德夫妇金婚合影	(209)

图附录 1-3	《泰晤士报》报道“金婚”	(210)
图附录 1-4	1904 年慕雅德和他的家人	(211)
图附录 2-1	慕雅德、慕稼谷	(214)
附录图 2-2	1877 年圣公会孝闻街教堂	(216)
附录图 3-1	慕尔家族	(219)
附录图 3-2	慕稼谷一家	(220)
附录图 3-3	慕雅德一家	(220)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意义

本书以西方传教士的视角为着眼点,从三个方面聚焦晚清中国研究。晚清的起始点可以有几种界分方法,如果以社会性质的转变来划分,即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那么应当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为界分点;如果以清王朝的衰落为界分点,那么应以道光皇帝即位的 1820 年开始;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则从 1800 年开始;史学界基本取得共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晚清社会应从 1840 年开始,至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

传教士有关中国的研究,是归于“汉学研究”还是“中国学研究”,学界一直有争论。有学者认为 Sinology 的词根“sino”源于秦朝的“秦”(Sin),所指是中国,另有学者认为,Sino 是日语“支那”的英文音译,而日本人把中国南方和东南亚蔑称为“支那”。法语“Sinologie”(英文 Sinology)一词则出现在 18 世纪末,1814 年 12 月 11 日,法国法兰西学院雷慕沙(Abel Rémusat)创设西方汉学“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的讲座,这是真正经院式汉学研究的肇始。汉学主要指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包括中国古代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国学

涵盖了汉学的内容,又扩展了当代中国研究的范围,也包括某些“专学”研究,如敦煌学、考古学、突厥学以及藏学等。之后,汉学衍生为“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和“中国学”等不同名称。熊文华认为:“由于汉学的发展、演进,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出现相互兼容并包状态。Sinology 承继了汉学的传统,也容纳了 Chinese Studies 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①陈峰认为,1925 年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成立,是美国汉学彻底摆脱古典和传统而转向现代的一个重大标志。^②美国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口问题、土地占有和农业技术问题、工业化问题、家庭问题、殖民机构问题、民族运动问题、国际政治关系问题、商业投资问题,等等。此类研究的目的显然是服务于美国政治,美国汉学也嬗变为美国“中国学”,而美国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是费正清。纵观世界各国高校,汉学研究经常归于“东亚”(或亚洲)研究系,处在“边缘”地位,无法进入哲学、史学、文学等传统或“正统”的领域。学者周法高(1915—1994)曾经对用“汉学”来指称中国文明的研究表示强烈不满,因为他认为“汉学”与“印度学”“埃及学”等专业一样,已经式微,而中国文明并没有衰亡。^③

近代汉学的兴盛主要归功于西方来华传教士,他们不仅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同时也促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中西对话的一个高潮。他们在中国传教,同时用文字记载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感想,他们的著述向西方传递了一个特殊视野下晚清中国的形象。他们是怎样建构中国这一形象的?他们的中国学研究在历史的维度上与早先传教士相比,产生了怎样的变迁?晚清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是否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引起?研究西方传教士不仅能使我们了解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汇中所起到的作用,而且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晚清中国社会的政治、外交、文化和社会百象,在西方的视野下对晚清中国有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① 熊文华:《英国汉学史》,文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 页。

② 参见陈峰:《趋新反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文史哲》2008 年第 3 期。

③ 参见周法高:《汉学论集》,精华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6 页。

一、西方中国观的变迁

在研究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慕雅德(Arthur Evans Moule)的中国观之前,我们先来追溯一下历史上西方人士有关中国观的变迁。历史上有关中国的游记首推《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Marco Polo)曾于13世纪即元朝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17年。他的游记描绘了中国富丽堂皇的皇宫、丰饶的物产、发达的工商业、繁荣的街市、便利的交通、广泛流通的货币。马可·波罗称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堂之城”。他这样描述元朝大汗的形象:“他所拥有的臣民之多、疆域之广、财富之巨,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君主。”^①尽管这部《游记》对这个东方古国“充满故弄玄虚的溢美之词,但却是第一次向西方定格了中国的‘国际形象’”^②。英国的曼德维尔爵士(John Mandeville)^③未曾到过中国,他的《曼德维尔游记》根据鄂多立克(Friar Odoric)的《东游录》而作。该著作综合了中世纪西方对东方的认识,采用当时最流行的游记形式,记叙了一个神奇富饶的中国,国土广袤,统治严明,拥有无尽的宝藏等,这些描述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无限好奇和想象。

16世纪伊始,来华耶稣会士(Jesuits)成为沟通东西方的使者和中国形象的传播者。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于1583—1610年在中国生活,对中国蕴含哲理的文化传统以及统治者的权威充满敬畏。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吸引了西方社会,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富庶的物产及精美的陶瓷等引起了西方人的浓厚兴趣。中国人重视学问,凭真才实学得到升迁,这与欧洲的贵族世袭制形成鲜明的对比。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的《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一书,文字形象生动,语言幽默机智,向西方展示了中国,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

① Marco Polo.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omas Wight, ed.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86, p. 198. 本书英文著作引文部分除了中译本外,均由本书作者翻译。

② 官濛、杨舒:《镜与影: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③ 14世纪英国作家约翰·曼德维尔根据马可·波罗和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Friar Odoric, 1265—1331)的《东游录》游记,幻想创作了《曼德维尔游记》,介绍中东、中亚、印度和契丹(中国)。

国的赞美之情。伏尔泰(François-Marie Arouet)的《哲学通讯》《风俗论》等著作也盛赞中国的文化和孔子学说,他指出:“对中国礼仪的最严重误解,肇始于吾人以己之风俗杜衡彼之风俗,吾人以偏颇天性所生之偏见,来看待世界之种种目的。”^①他强调不同文明的价值,也批判了欧洲人的自负,同时借此抨击了18世纪法国教会的权力。他说,如果中国的文明昌盛归功于儒家思想,孔子却非基督教徒,那么一个国家不需要教会的力量也能获得令人敬仰的成就。从中可见西方智者仁人渴望在中国找到更原本更纯真的生活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进,中国的形象从梦幻般的传奇想象时代进入到理性的时代,由浅入深,从模糊到清晰,西方对中国的关注从制度层面进入到思想层面,西方出现了“孔教乌托邦”的中国形象。西方哲学家盛赞中国的道德文明、政治制度和神明的君主,中国形象成为他们批评现实、变革社会的武器。在启蒙时代的德国,莱布尼茨^②将自己的数学成就与中国经典《易经》联系在一起,他对中华民族极其敬佩,认为“地球上还有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各方面都有教养的民族更具有道德修养”^③。欧洲启蒙时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赞美,体现了上升时期的欧洲对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仰慕。

然而,随着欧洲中国热的逐渐退潮,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康熙于1706年下旨驱逐在华耶稣会士,罗马教廷于1773年决定解散耶稣会,中国自此失去了耶稣会士的公开支持,在国际上的声望跌入低谷。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④的《论法的精神》(1748)和卢梭^⑤的《论科学与

① 伏尔泰:《风俗论》第1卷,蒋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6页。

②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涉及法学、力学、光学、语言学等40多个学术领域,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

③ 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④ 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

⑤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瑞士裔法国思想家、哲学家、作家、政治理论家和作曲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

艺术》(1750)都不约而同地贬低中国。1793年,英国全权特使马戛尔尼^①出使中国,由于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无功而返。^②他把一个腐败衰落、狂妄自大的中国形象传达给了西方世界。他回欧洲后曾经评论道:“中华帝国是一艘破旧、疯狂的超级战舰,一百五十年来她幸得一批干练而机警的朝廷官员的努力,得以漂浮在水面上,以她庞大的外表吓唬她的邻居……也许她还不会马上沉没,像一艘破船依然漂浮一段时间,然后在岸上撞成碎片,但她永不可能在旧的基础上得以重建。”^③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斯当东^④《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也向欧洲传递了中国的负面印象。他认为:“中国的近邻小国的确在各方面都比中国落后,这是他们对待外人目空一切、高傲自大的根源。在蒙古人入驻中国之前,欧洲人正处在黑暗时代,马可·波罗彼时游历到中国,当时中国文化处在最高峰,比同时期欧洲的确先进得多。但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即停滞不前,而欧洲的技术知识和文明发展,都日新月异。欧洲人来到中国,他们不再像最初欧洲人写的游记上那么羡慕了。在中国人同使节团的谈话中,他们承认在某些方面中国人不如英国。”^⑤

德国思想家黑格尔从自己的思想体系出发,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发表了很多否定性的评论,他认为:“中国文明在古代经过发展后,就不再前进,那种不断重复出现的、停滞的东西取代了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当西方国家在迅速发展,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和印度处在历史之外。”^⑥

① 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英国18世纪一位政治家、皇家大臣和外交家,1792年被封为马戛尔尼伯爵,后作为英国特使派往中国。

② 参见官濛、杨舒:《镜与影: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③ Stuart Creighton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The American Image of the Chinese, 1785-18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 43.

④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英国19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汉学家,被誉为英国汉学研究的创始人,参与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过程中的活动。

⑤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73页。

⑥ 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